



悦耳 的 钟声

【苏】尤·兹巴纳茨基著 翁本泽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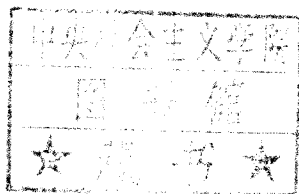


I512.532
/4



200197982

悦耳的钟声



〔苏〕尤·兹巴纳茨基 著

翁 本 泽 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悦耳的钟声

〔苏〕尤·兹巴纳茨基 著

翁本泽 译

责任编辑：郭锬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2次印刷

字数：348,000 印张：15 印数：19,601——34,100

统一书号：10109·1448 定价：1.95元

作者简介

苏维埃乌克兰作家格里葛利·奥里费罗维奇·兹巴纳茨基（即尤里·兹巴纳茨基），一九一四年出生于乌克兰契尼戈夫省。一九三二年毕业于师范学校后，即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党务工作者和新闻记者。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

卫国战争期间，乌克兰的大片土地遭受德军蹂躏。作者深入敌后组织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为游击兵团——肖尔斯游击兵团。他是这个游击兵团的指挥者之一。由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树的功勋，兹巴纳茨基于一九四四年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兹巴纳茨基是一个坚持用本民族语言——乌克兰语写作的多产作家。作家较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有：《收获之前》、《索柯林密林中的奥秘》、《索柯林之夏》、《森林美人》等。这些作品富有浓郁的乌克兰泥土气息，他把自己的作品和美丽、富饶的乌克兰森林田野，风土人情融为一体。由于文学创作的出色成就，兹巴纳茨基曾多次荣获舍甫琴柯和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奖。《悦耳的钟声》是作者第一部被介绍给我国读者的作品。

《悦耳的钟声》一书向读者展示了一所苏维埃学校对青少年教育的有趣画面，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教育诗。本书问世后，曾轰动苏联文坛，在读者中反响强烈。

2271/69

主人公查鲁日内依是个年轻而有理想，富有实干精神而有所革新的中学校长。他任职的这所偏僻的林区学校，是一所苏维埃政权诞生二十五年之后，学生上课率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学校。学生中的愚昧和不文明行为和以教务主任为代表的保守习惯势力使满腔热情的教师心灰意冷，没有文化的家长听天由命，天真无瑕的少年随波逐流。新校长到任后，深入社会、学生、课堂、教师和家长之中，言传身教，不畏艰辛，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使柯瓦廖夫卡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成绩和上课率名列全区前茅。校长查鲁日内依对顽劣儿童彼得罗循循善诱的教导所取得的积极效果，在本书中描写尤为真切生动，感人肺腑。被教务主任当作“不可教育的”少年彼得罗终于长大成材，走上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前线。

查鲁日内依和青年女教师雅琳娜的纯真、高尚的爱情贯穿全书。小说对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隐藏在心灵深处、互为信赖的爱情刻画得颇为细腻，别具匠心，感人至深。

本书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本译出（《МАЛИНОВЫЙ ЗВОН》，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62г）。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十月

我的学校！我亲爱的学校！岁月使你完全改变了容貌，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你还是同那遥远的三六年我第一次看见你的那个模样一样。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和初出茅庐的教师，跨进了你的门槛。作为我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的见证者，你活着并将永远活在我的心坎里。我心花怒放，高兴得几乎要流出眼泪。当走进院墙内肃穆、凉爽的气氛之中，独自在各个教室里徘徊时，思潮滚滚，往事涌上心头……

遭受暴风雨的侵袭、布满弹痕的发黑的砖墙，在无穷无尽地思索；遭受风吹雨打、年久失修的屋顶，在骄阳下变得翘曲不平；整齐的黑杨，在学校上空沉思地轻轻絮语。

从前，这里是多么美妙的地方啊，——白色的墙壁在欢笑，宽敞的窗户以那柔和的闪光招引着人们。充满生命力的高大黑杨，日日夜夜地在校园上空喧嚣，而在附近阳光灿烂的林中空地上，一棵新成长的白色树皮的白桦，发出簌簌的声响，仿佛一个欢乐又亲切的盛装少女，钟情地爱恋着微风，——清晨和傍晚，微风轻

轻梳着它那葱绿的长辫……

当年，在那扇窗框象蓝天一样蔚蓝的窗户里，直到深夜还亮着黄色的灯光。那是我桌子上煤油灯的亮光。现在它在哪里？对于这盏油灯，我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正是它，欢乐地眨着眼睛，沉默地窥探着我的思绪，只有它知道我青年时代的抱负；也许，谁也不能象它那样完完全全地了解我，同情我，正因为如此，它才那样熠熠不停地照耀着我。

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这样的事情你不会忘怀，你不能不去想它。

今天，在那破旧的、被遗忘了的老校舍附近，骄傲地耸立起新建的校舍。这座充满活力的建筑物的窗户露出嘲笑的眼光，冷眼看着低矮发黑的老校舍。为使观瞻壮丽，建筑物上饰了飞檐，当然还有尖顶，不用这样的结构，不作这种过分时髦的设计，设计师是不甘罢休的。新的学校以自己如画的建筑，增添了附近的美景，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老校舍里，它看见了一切，经历了一切，吸引着行人的注意。

可不是么，任何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我们祝愿新的学校在自己的墙垣里，同样能窥到在被半遗忘的老校舍中所见到的那么多美好的一切。这一切已经沉思地隐蔽在枝叶茂密的黑杨树冠下面，也许，在忧伤的沉思之中，回忆着不能忘怀的和一去不复返的消逝了的岁月。在那些日子里，在学校附近阳光灿烂的林中空地上，一棵欢乐的白色树皮的白桦，天天在戏闹、舞蹈，——每当傍晚和黎明，微风深情地梳着它那金绿色的、沉甸甸的长辫子……

当我觉得这片林海是如此漫无边际时，四周突然开朗起来。狭窄的林间小道变得广阔起来，头顶上露出一片无云的蓝天；在矮小、幼嫩的橡树丛后面，露出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里是一望无际的黄褐色荞麦。在这片荞麦后面的一个山谷里，在那笼罩着轻纱似的灰蒙蒙烟雾的地方，露出一个村庄。

“那就是我们的柯瓦廖夫卡。”霍马·嘉吉尔大爷向村庄那边点了点头。

这条道路和这个村庄都使我感到喜悦。我也是在波列西耶*长大的，但是，在我们家乡却没有这样的森林。那里尽是小树林，灌木丛和橡树林。树林里有的是蘑菇，到了秋天，枝头橡实累累。而这里却是大森林，况且又是这样无边无际的大林海！……我们坐着马车似乎走了四十多公里（虽然嘉吉尔大爷对上帝发誓说，总共只不过十五俄里**），可是我们既没有看见一个村庄，也没有见到一户人家。头顶上老是响着象金子铸成的高大松树发出的林涛声。路上有高低不一的树墩，大车轮子碰上它，就弹跳起来。在大树丛中，常常会出现开阔的林中空地，紧挨着原始森林的一些地方，有新栽的松树林。低矮、多枝的幼松密密地覆盖着地面，连青草也无法生长。闻到一股扑鼻的松脂气味，还有一种你闻了

*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多林地带的名称。——译者注。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注。

以后却说不出来的气味。

刚刚进入这一森林王国时，我惊讶地眺望着这一切，简直给迷住了：我陶醉在森林空气的芬芳之中。在草地上、蘑菇丛中和干燥的土窑上都有这种芳香。后来我的思绪从这片森林飞到了辽阔的故乡，飞到了捷斯纳湖畔，在这仲夏季节里，那里是一片蔚蓝、宁静的湖面。

要不是有这一位霍马·嘉吉尔大爷，在这陌生的路上，我想必是会愁闷起来的。我的旅伴是一位异常健谈和平易近人的老大爷。

我是在区中心找到他的。我们当教师的总是能找到和自己同路的大车，——这里是市集。在还没有打扫的广场上，只停放着寥寥可数的几辆大车。我在这几辆大车之间走来走去，询问着：“有没有柯瓦廖夫卡来的人？”有人给我作了指点：“小伙子，你去找那位大爷吧！”

这是一位中等身材，体格魁梧的老大爷。他那密密的粗硬的头发，一直长到眼皮上，毛发蓬乱的脑袋，象直接栽在肩上一样；一条好容易才看得出来的分界线把头和肩膀截然分开，几乎完全没有脖子。一只硕大的鹰钩鼻子隐藏在蓬乱的络腮胡子之中。

“您好，大爷！”我向老人问好。

他不大乐意地，象一只狼那样，全身向我转了过来，长着灰白色细毛的倒竖的眉弓下面露出两只小眼睛，发出两道利剑似的光芒。这目光能洞察一切；在老人的眼里，既含有一种极其聪明的光芒，也含有一种粗野的、林区人所特有的光芒。

“你好，老弟，如果不是闹着玩的话！”

“您是柯瓦廖夫卡来的吗？”

“暂时是柯瓦廖夫卡来的。”

“能搭您的车吗？”

老大爷抬起布着小黄点的灰色眼睛，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愉快地发出咯咯的笑声，神秘地使了个眼色：

“能请我喝两盅？”

说这话的时候，他用粗糙的大手摸摸胡子，仿佛人家已经给他斟上了满满的一杯酒。

我们很快就动身了。经过一座桥，在尖尖的小石子路上颠簸了数公里，最后钻进大森林中，这片大森林在远远的地方就以它那青葱的外貌吸引着我了。

出了城，老大爷就打开了话匣子。

“这样，一般说来，你是到柯瓦廖夫卡去的？”

“到柯瓦廖夫卡去，”我说。

“是共青团的特派员，或者，也许是来收羊毛的？”

“不，”我答道。“叫我去当校长。”

大爷全身向我转了过来，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了一两分钟。

“真糟糕，没想到。压根儿没有这样想过。”

这种坦率态度使我高兴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内心深处却在埋怨。

“为什么没有这样想？”

“小伙子，象你这样的年轻人，不是人人都象你这样聪明能干的。”

我的脸红了起来。好在老大爷根本没有注意。

“说实在的，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啦。不过现在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年纪不轻啦，可是脑袋瓜里没盛一点东西……这么说，你是个好样的，年纪轻轻，却很能干。不管怎么说，上级决不会叫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当校长。请问你的大号？”

“塔拉斯·杰米陀维奇。”

“也和我们一样，是穷苦出身？”

“您根据什么这样看呢？”

“哈哈！你瞧，塔拉斯，这不是地主的名字。还有杰米德，也不是教士式的。人们就给我取名叫霍马……”

“父名呢？”

霍马大爷令人纳闷地哼了一声，沉思了一阵子。

“人们就这样叫我：霍马·嘉吉尔。或者嘉吉尔·霍马。或者干脆叫霍马。至于父名么，一般说来，给猪吃啦。我是非婚生的……想当年就没有给我取上父名。小伙子，我就一辈子没有父名。你看看，别人都有名字和父名，可我就只霍马二字。”

看样子，霍马·嘉吉尔对于自己没有父名并不过于悲伤。这反而使他更风趣——老大爷的眼睛调皮地眨动着，胡子在鹰钩鼻子下面微微抖动——老人忍住快活的讥笑。

“霍马大爷，您多大岁数啦？”

“岁数？”

霍马的宽阔的脑门上皱起了手风琴琴箱似的皱纹。惊慌地眨巴了一阵子眼睛，后来皱纹舒张开来，而胡子却又微微抖动起来。

“你给我算算看，我多大岁数。彼得堡的沙皇被杀那年我讨了老婆。这件事情好象才是刚刚不久之前似的，可那时候你父亲大概还没有出世呢。况且我讨老婆时年纪已经不轻啦，在那年头，象我这样的人讨个老婆可不容易呢，既没有爹，又没有地。我不知费了多大劲，四处奔波，——既然我要东奔西跑，说明我是个狗崽子，——直到最后才说服了一个婆娘，她就是我的老婆。”

“到底还是说服了？”

“当然说服了。小伙子，当年我虽是个没爹的人，可我却是个

全村有名的年轻小伙子。唔，说实话，当我们生活在一起之后，她也抱怨自己的命运，可是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谢天谢地，凑合着过了一辈子，养了孩子，和别人一样，进了坟墓，——用不着埋怨上帝啊。”

嘉吉尔大爷是一个坦率的人。以后我听说，他在村子里也算是个不错的人——有点文化，在人们面前也有值得自夸的地方。

“还在一九〇五年，我们就打倒了该死的地主，当时我已经是个人有觉悟的人了，十分痛恨这些剥削者。我可也要求有自己的土地：孩子多起来了，妻子进了天国，我十分痛苦，我们也有一双手，为什么你要去央求他们？不错，我们村里没有地主，我们就到库列尼去，有十二俄里路，——帮助库列尼人打倒当地的地主。啊，当时那地方有些人可发了财，什么东西都拿！可我只背了一麻袋书，——我讨厌抽烟，我也不会卷烟。人家卷烟卷，我就抽空看看书。直到如今我还想看书，可是看不清楚啦：字母在眼前模糊不清了。”

一路上这样交谈着，路就缩短了。大概，霍马·嘉吉尔对自己的身世还讲不到一半，就在雾蒙蒙的山沟里看见了柯瓦廖夫卡。

大车进了村。干瘦的马兴高彩烈地磕击着蹄子。嘉吉尔大爷不慌不忙地下了车，一瘸一瘸地迈两条麻木的腿。这个矮墩、结实、粗笨的老头，穿着肥大的呢裤和古怪的灰褐色麻布衬衫，戴着一顶沾满油污的帽子，赤着双脚，活象吉卜赛人带到市集上来耍把戏的脱了毛的一头老熊。

我仔细地看柯瓦廖夫卡。我喜欢这些用多脂的方木建成的宽敞、高大的房子。这里的畜栏不象我们那样是用藤条编成的，而是用粗原木构筑的。我们那里只能用这样的木料来造房子。这里不用藤条编篱笆，而是用板墙，或者用树木构筑栅栏。

霍马大爷停了车，用鞭子向旁边一指。

“校长同志，那就是你们的学校。”

在村子尽头，紧挨着森林，我看见高大的黑杨丛中，有一长排低矮的建筑物。学校里宽敞的窗户亲切地看着我，玻璃窗上发出欢乐的反光。

“也许，我送你到校门口，还是你自己走去？”

我到指定地点来报到，暂时还没有带行李，在大车后面放着我的满是皱纹的皮包。

“谢谢，大爷。”

我拿起皮包，跳下大车。

“随你的便。其实可以送你去——又不远。”

我在口袋里取出钱——给大爷喝杯酒。霍马·嘉吉尔瞟了我一眼，转过身去。

“什么酒钱也不要。校长同志，可以这样说，我是集体农庄里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村苏维埃委员。你们可能听说过，我们的头头，涅陀库斯同志，当我被选进村苏维埃时，他曾经说过：‘霍马，您可以随便挑一个父名。可以叫霍马·伊凡诺维奇，或者就叫霍马·根纳季耶维奇。’这可简直叫我生气了。他为什么要称我为什么‘根纳季’？干吗要给我教士的父名？我们村里有一个神甫叫根纳季，竟拿他当我的父亲！我就没有要什么父名，乖乖，就是没有要。这不是明摆着吗，只有无知无识的蠢货才会要，而我却说：‘既然我的父亲，他这条狗，能够和人姘居生下了我，后来却遗弃了母亲，偷偷地外出流浪，那就叫这样的爹见鬼去吧！没有他我也活下来了，今后还得生活下去。’就这么回事，小伙子。而你却要给我酒钱……”

“这可是讲好了的！”

“这对你用不上。这是对采购人员的。那号子人的钱我就收下来。可是你是我们的校长，有文化的人。我还是喝杯茶吧。我同老师是友好的。以后我来看你。”

霍马大爷友好地同我分手，赶着车走了。而我活动活动麻木了的腿，从容地顺着小路走去。

2

越接近学校，我的脚步就迈得越慢。我的心忐忑不安地跳动着——猛跳几下，又停下来。我调到这里来可不是待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的，——说不定要永久待在这里。

我想起了在区人民教育科科长办公室里的谈话。

当我函授考试回来，区教师会议已经结束。我到人民教育科去了解一下，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有没有提到我的那所学校。当时我是斯克雷巴里学校的校长。

督学伊凡·伊凡诺维奇·戈罗别茨高高兴兴地同我打招呼，他是一个温和、肥胖、非常灵活的人——成天象流星一样在各个学校里穿来穿去。他喜欢吹毛求疵，甚至还会大声呵斥。不过，大家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常常嘲笑几声，皱皱眉头。他常把这种游击式的视察结果向区教育科科长凯嘉格同志汇报。

我还记得这个戈罗别茨第一次到我们学校里来的情形。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校长，确确实实没有经验。不管怎么说，戈罗别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有很长的教龄，而我是初出茅庐的青年，

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戈罗别茨听了一整天课，记了些什么东西。他也到我的课堂里听过课。我等着挨训，而他却说：“不错。”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唔，大概总归有些缺点吧？”

“谁没有缺点，塔拉斯·杰米陀维奇？人人都有。没有缺点不可能生存。没有缺点——星球上的生命就停止了。这是矛盾的统一嘛！”他含意深奥地向上举起一个手指，而在当时我刚刚开始研究哲学，——我仅仅胆怯而恭敬地斜眼看了一下这个权威的手指。

晚上，当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督学作了暗示——问我有没有可以润润喉咙的东西。他大概在路上受了凉，担心喉咙嘶哑。

我很乐意地到商店里去了。店里没有半公升的瓶装酒，只有一公升装的大瓶杂酒。其中的一瓶搬到了我们的餐桌上。我看看这瓶酒，心里直发愁——叫我拿它怎么办？唔，戈罗别茨不过喝上一二杯，剩下来的叫我怎么对付？

戈罗别茨轻巧地打开瓶盖。桌子上只放着一只很浅的高脚玻璃杯。他郑重其事地向四周张望了一阵子。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大杯子，就拿过来，把杯子里的水倒进种着现已枯萎了的橡树的花盆中。他把这两只杯子斟满伏特加，使我吃了一惊的是，他把大杯子放到我面前，而在自己面前放了高脚玻璃杯。我摇摇头说，我不会喝酒。他看看我的眼睛。

“有思想基础吗？”

“有，”我回答他，“我是共青团员。”

于是戈罗别茨就交换了杯子：给我高脚玻璃杯，自己拿了大杯子。

“我作为党外人士，什么都可以，”他苦笑着作了解释。

开始喝酒。戈罗别茨喝伏特加是一干到底。

我的发愁是多余的：戈罗别茨不但把一瓶酒全喝光了，而且把我的那杯也喝下去了。这天晚上他老是炫耀自己的教育才华。已经上床睡觉了，他对我这个青年校长提了个意见：

“塔拉斯，你得学会喝酒。如果不会喝酒，算什么校长！”

自从那一回之后，戈罗别茨每次到学校里来，我就不再请他喝伏特加了。他到我们学校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但是我每一次都高高兴兴地接待他，象老朋友那样。

有一次他一眼看见我，就高兴得喊叫起来：

“你可来得真巧！快去，塔拉斯·杰米陀维奇老弟，快去找马克西姆·伊凡诺维奇！有重要事情，老弟。这样的事情，没有半公升酒还解决不了呢。”

我的心紧张起来了。对于马克西姆·伊凡诺维奇·凯嘉格，我们的区人民教育科科长，我们虽然喜爱他，但却有点怕他。

“那是什么事情，伊凡·伊凡诺维奇？”我用祈求的眼光看着戈罗别茨。

“害怕啦？哎呀，你们这些校长！……当年我当校长的时候，是全省鼎鼎有名的校长！你明白吗，塔拉斯·杰米陀维奇……”

我仔细看了看戈罗别茨的眼睛——他的眼睛已由于酒醉而无精打采了。光凭这一现象和伊凡·伊凡诺维奇滔滔不绝的言谈，就可以推测出，他已经和什么人情投意合地“交谈”过了。当然，这也不足为奇——这恰巧是这样的时候了：有些教师象黎明时的鸭子，正在区里奔走，动脑筋为下一学年谋一个好席位。

我走进凯嘉格的办公室。

“噢，查鲁日内依！”马克西姆·伊凡诺维奇似乎是满意又象是吓唬人似的拖长声说。

我心里想：“他马上会叫我冒一身汗。”

凯嘉格同志大概比我大不了几岁。如果我是二十三岁，我看他是二十五岁，最多二十六岁。但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原则性很强的人。也许，这是因为他已经明显的开始秃顶，——现在他的脑门和苏格拉底*一模一样。也许，另外的因素起着作用：凯嘉格处事从容不迫，身体肥胖。此外，区里器重他，他是区党委委员，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区无神论者联盟主席。他讲起话来总是那样稳重，公事公办的口气，对交谈的人只称呼其姓，从不叫名字和父名。

马克西姆·伊凡诺维奇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会儿，好象一开始他不相信站在他面前的是我。

“那么，回来啦？”

“回来啦。”

“考试及格了吗？”

“及格了。国家考试通过了，就这样。”

“很不错。”

听见领导的赞扬，我心里乐滋滋的。

马克西姆·伊凡诺维奇沉默了片刻，不知为什么把桌子上的文件挪动了一下。

“这么回事，查鲁日内依，”他终于说，“你就不必再到斯克雷巴里去了……”

我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已经在斯克雷巴里非完全中学当了两年的校长。大家都说，我自己也看到，学校搞上去了，变成了先进学校。可是今天竟叫你……原来戈罗别茨不是无缘无故吓唬我的，他暗示有什么重要事情。原来把我撤职啦。马克西姆·伊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生于纪元前四六九年，死于纪元前三九九年。

——译者注。